

数字媒体与阿拉伯之春

撰文：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N. Howard）

穆扎米·侯赛因（Muzammil M. Hussain）

翻译：方可成

我们将证明：在最近的几年中，信息基础设施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开启了民主化和巩固公民社会的新路径。

一

截至 2012 年，埃及和突尼斯都已经举行了大选，并起草了新宪法；摩洛哥和约旦都有了新的议会和内阁，它们都做出了扩展公民权利的重要承诺。传统的政治角色被卷入了大众民主运动中。即便是那些统治家族依然掌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也不得不通过大幅度提高公民福利以维持稳定。还有一些国家如今处于过渡政府的控制下，宪法并不完备，且存在着掠夺性的军事集团。我们还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对新政府的民主实践做出评价，但即使在那些伊斯兰教势力上升的国家，最有前景的伊斯兰教领袖们也参与竞选，推广着不同的伊斯兰宪政主义。

由持续和平抗议带来政权制度变化的最成功案例，是突尼斯和埃及。这两个案例都包含着这样几个阶段：

——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活跃分子使用数字媒体建立起紧密的网络，确定集体认同和目标；

——点火阶段：在这个阶段，将会出现标志性的重大时刻，这些时刻被统治精英和当局有意无意地忽视，但却刺激着大众的神经；

——抗议阶段：在这个阶段，通过使用线下网络及数字技术，小团体有策略地大量组织起来；

——国际支持阶段：在这个阶段，数字媒体将区域性的新闻报道扩展至国际传媒网络；

——高潮阶段：在这个阶段，当局或精心、或胡乱地进行应对，以平息公众的不满，通常使用的方法是承诺提高福利，或者采取严酷的镇压行动；

——最后，信息战阶段：在这个阶段，来自国内国外的公民倡导网络等种种不同角色互相竞争，以影响公民社会的未来走向，并影响决定公民社会走向的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这种关于政治变革的叙事适用于“阿拉伯之春”中的许多案例，但它没能解释在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的一些重要因素，也无法解释那些从变革中获益的政权和根本就没有经历任何显著自由化的政权。在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状况之后，我们认为：信息基础设施——特别是手机的使用——始终在决定政权脆弱性和社会运动成功前景的简单模型中扮演着关键因素。互联网的使用在一些案例中也有相关性，不过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互联网缺位导致社会运动成功的概率低。

这是阿拉伯世界第一场取得胜利的大规模要求政治经济改革的运动，从这场运动的几个关键步骤来看，可以非常明显地得知：信息基础设施反复成为政治争夺的工具和交火点。

尽管我们可以总结出运动的几个阶段并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有一点是必须认识到的：在阿拉伯世界，既有很多成功运用数字媒体的案例，也有一些重要的案例中数字媒体并没有起到太多作用。例如，阿联酋和卡塔尔以阿拉伯世界中最高的互联网普及率和电子政府发展水平为豪，但它们却没有遭遇任何成功的线下动员。此外，沙特阿拉伯、伊朗等政权可以非常娴熟地进行信息审查和管理。

在此前针对“阿拉伯之春”发展过程的观察中，我们也发现了四项关键条

件，它们都因手机和数字媒体的普及而变得可能：国际新闻生产和消费的增加；社交网络的广泛普及和使用；在线公民社会的巩固；越来越普遍的互联网接入，使得包括女性、少数族裔在内的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正如“阿拉伯之春”期间证实的那样，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BBC 以及其他相关的国际媒体打入了阿拉伯国家内部，传递了与国家控制的媒体相反的政治信息。独裁政体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关起门来玩弄腐败的选举，不给公民提供必要的福利了。

此外，当政治动荡期出现的时候，这些国际媒体还发挥了一项重要作用：向海外的政治流亡群体传递消息，有时候还鼓励外国政府介入——就像利比亚的例子那样，虽则叙利亚的例子没那么成功。这种国际性的公民网络被国际媒体放大，也被成功的网络连接放大，这种连接是因为 Facebook、YouTube、Twitter 等社交媒体工具的普及才变得可能的，它让普通公民也可以参与政治信息的塑造和传播。的确，公民记者所拍摄的视频和撰写的博客在传递突尼斯、埃及、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的自焚事件消息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正式的公民组织同样让公民社会得以巩固。埃及“四月六日青年运动”这样的公民社会群体，以及穆斯林兄弟会这种被禁止但影响力超群的政党，都成功地利用了信息基础设施来进行政治组织和能力建设——这种利用是持续发生的，并不仅仅发生在上街抗议的阶段。“四月六日青年运动”至少从 2008 年开始就已经很活跃了，而穆斯林兄弟会则已经建立了超过埃及其他任何政党和运动的大规模博客和新闻生产生态。

最后，特别是在中东的妇女当中，许多人——包括但不限于女权主义者——已经将政治权利的内涵从投票权扩展到了开车权，尤其是在沙特阿拉伯，她们是通过在线倡导运动来做到的。一个名为“pink hijabis”的群体尤其善于使用媒体，她们的具体行动是向亲友传播关于女性外阴切割的电影，组织关于技术策略的工作坊，并从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学习使用数字媒体的成功经验。

以上是一些在封闭独裁政体的社会中发生的关键变化。它们证明，在这些地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正是数字媒体的长期普及和使用。

二

到目前为止，有两种描述“阿拉伯之春”起因和后果的方式。第一种分析框架，是找出那些使一个国家容易遭遇抗议的原因；第二种则是找出可能解释一场起义为什么成功的原因。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寻找简单或单一的解释，而应该观察到其中的复杂因果关系，甚至是一些组合型的关系，为几组案例提供分析框架。根据已知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体变迁的事实，我们应该寻找一套多重指标，它们可以一起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已经有很多国家的个案研究表明，ICT（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巩固民主和维持独裁两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在我们的研究中，比较的视角并不限于那些可被视为标杆的案例，甚至不限于那些以技术驱动、强化、激活了政权变化为突出特点的案例——我们同样会关注那些信息技术在推动民主方面很少或根本没起作用的案例，也关注那些信息技术被独裁统治精英利用以成为更成功独裁者的案例，还关注那些信息技术在突然的民主转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案例。因此，我们的方法绝不同于那些仅凭一个案例就总结出“信息技术在民主化中扮演中心角色”的研究，也不同于那些仅仅依赖各国互联网渗透率数据建立的统计模型就做出总结的研究。

我们研究的案例是存在大规模穆斯林群体的阿拉伯国家——至少有 22 个。我们将证明：在最近的几年中，信息技术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开启了民主化和巩固公民社会的新路径。

定量研究者经常将“民主化”转换为一个指标，而西方民主国家则是其标准。但我们认为，这 22 个国家的民主化最好按照更符合实际的标准进行估量——将黎巴嫩这样的国家设为上限，而沙特阿拉伯则为最下限。这一标准并不排除存在一种理想的伊斯兰民主政体的理论可能性，因此，我们假定健康运行的穆斯林民主国家可能跟西方民主国家看起来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对民主效果进行精细地评级，同时要检验每一个国家自“阿拉伯之春”以来经历民主转型的证据。

在找出案例之间几项共同的重要因素的同时，我们必须尊重这些国家之间显著的多样性。

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差异很大，我们通过人均 GDP（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进行衡量，它可以反映不同国家的公民拥有财富的差距。除此之外，这一指标对于了解相对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率也很有帮助，避免扭曲不同国家间收入的真正差距。在这一指标上，位居前列的富裕国家包括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平均在 20 000 美元到 70 000 美元之间），垫底的国家则包括吉布提、毛里塔尼亚、伊拉克和索马里（平均在 200 美元到 1 000 美元之间）。

财富的平均分配同样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常常以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衡量，反映着阿拉伯社会中不同成员财富占有的差距。在很多阿拉伯国家，财富的分配都是相对不平等的。相对平等的国家包括黎巴嫩和卡塔尔，而在不平等的国家中，更有极端的案例如阿联酋和埃及。

很多评论者注意到，工作机会的紧缺可能是很多国家中不满情绪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突尼斯（失业率达 14%）和也门（失业率 15%）。然而，那些失业率很低的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5%）和科威特（1%）同样面临着政治上的不满和抗议。

要理解正在经历深刻政治社会变革的阿拉伯世界的宏观社会背景，除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之外，还要考虑一般的人口数据：总人口数，城市人口比例（城市是数字媒体用户最密集的地方），25 岁以下年轻人的比例（这群人经常被认为是缺乏政治权利和最愤怒的）。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城市化率最高（96%—98%），也门和索马里则最低（32%—38%）——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最高的年轻人口比例（45%），而卡塔尔和科威特则最低（16%—23%）。在总人口数方面，卡塔尔和科威特远低于一千万，也门和索马里则远超过这一数字。要解开政治变革的“处方”，理解总人口数和可以上网的城市愤怒青年的比例之间的动态关系能提供非常重要的背景。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用来预测一个政权能否坚持拒绝政治变革，那就是它能使用的自然资源数量——这些资源可以带来缓冲的安全机制，或者用来进行财富分配，抚平不满情绪。在中东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

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家，出口大量原油，并因此享受着来自国际社会的显著支持，因为很多国家的外交利益首先在于维持地区稳定，避免不可预测的民主变革推翻独裁者的统治。如何衡量这一显著的因素？我们采用了国家的石油生产水平及其在全球可开采石油资源中的比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是排名最高的。

数字媒体的普及率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的可使用率是我们研究的核心变量。在这里，我们通过手机和互联网服务的扩散情况来观察数字媒体的普及率。有趣的是，一半以上的阿拉伯国家拥有超过 100% 的手机普及率，其中包括突尼斯（106%）、巴林（124%）和沙特阿拉伯（188%）。低于 100% 的国家包括埃及（87%）、叙利亚（68%）和也门（46%）。互联网普及率的情况与之类似，但比手机的普及率要低一些。互联网普及率在 25% 以上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27%）、突尼斯（34%）和巴林（54%），而普及率较低的国家则包括利比亚（5%）、也门（10%）和埃及（15%）。

与数字媒体的普及率形成对照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很多政权都建立了审查机制，这些机制的精细程度各不相同。如前所述，少数国家拥有非常精细的监控和管理系统，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巴林和阿联酋；而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利比亚在内的一些国家，要么不关心，要么没有能力去监控。为了衡量这一指标，我们创造了一个指数，它基于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 Net Initiative）对各国的监测，将国家分为几类：不存在过滤；出于政治、社会和安全因素对内容进行选择性过滤、大量过滤或普遍过滤；使用自动化的工具进行过滤。我们的指数将审查的多种面向和过滤内容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以评估一个政权控制新的信息基础设施的能力。

在对结果的测量方面，我们囊括了政权和平民主化的理想案例（埃及和突尼斯），也包括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做出重大让步的阿曼和沙特阿拉伯，还包括只在政治方面做出让步的科威特和约旦，以及只在经济方面做出让步的黎巴嫩和巴林，最后还包括了爆发血腥内战和（或）与统治精英之间暴力对抗的利比亚和叙利亚。我们考虑了每一则案例的具体信息，包括抗议的持续时间、死伤公民的数量、政治让步的类型、财富重新分配的程度等。

三

在“阿拉伯之春”的几个月中，互联网上发生了什么？哪些工具和技术结构促进了大众抗议的最初点火？哪些信息社会发展的长期前奏是它发生的必要条件？数字媒体只是简单地作为社会抗议的新“工具”吗？或者，我们需要对社会不满的现代特性、民众抗议的当代组织形式、公众表达异议所面临的变革中的机会结构了解更多？政权有没有做好准备、做好了多少准备来应对突发的被刺激的抗议？政权娴熟地管理信息基础设施，是否就意味着可以限制公民社会运行和组织的能力？

在许多经历过长久、持续抗议运动的国家中，已经存在了一批政治公众，他们早已上网，且形成了精通技术的公民社会群体——有的在地区内，有的则是跨越国界的群体。在政治危机发生时，跨国技术公司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有的积极向运动活跃分子提供可以创造行动机会的工具，有的则受到独裁者和独裁政权的压力，扮演了政治镇压的工具。

很难说如果没有数字媒体的话，革命就不会发生。确实，其他的社会因素，例如广泛的贫困和政府的无能，也制造了大范围的公众怒火。然而，民众确实直接使用了数字媒体进行动员、传播和协调。已经发生的压倒性证据详细地说明了这些抗议中政治变革模式的变化确实是数字媒体导致的，短期来看是这样，长期来看，从2000年开始也是这样。

对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研究来说，这些案例中有几样东西应该被置于更中心的位置考虑：抗议组织者的分布式领导，那些相对迅速加入抗议的精英公众（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人、女性，以及技术专家）核心群体，以及国际媒体扮演的重要角色：给予他们关键的发声机会和全球性的曝光，让他们免于遭到政权的明显暴力镇压。

我们还可以发现，互联网改变了政治角色之间沟通的方式——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网络分享了直接政治行动的策略，创造了区域性和国际性的新闻事件，引发邻国的关注和同情，并激发其他人加入其中。

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前的那些年里，包括手机、个人电脑以及软件在内的数字媒体是怎样扩散的。这些技术及其应用显著地影响了政治传播的系统及其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关系。小型、价格适中的移动电话使得普通公民也可以见证、记录、传播统治精英及安全部门的不公和镇压行为。更重要的是，玩弄选举的独裁政权同样因此落得声名狼藉，尤其是埃及 2005 年的大选，当时穆巴拉克的政党赢得了 89% 的选票，而上传到 YouTube 和其他视频分享网站的手机视频则揭露了计票和舞弊的真实场景。

过去五年中，半岛电视台成为在功能上独立的地区性新闻机构。在 2006 年增加英语频道后，它更是成为一个不断生产对独裁者控告、批评并报道其种种失败的国际性中枢。

广泛的互联网普及——虽然这种普及还限于中产阶级和城市居民——让普通公民每一天都可以跟踪媒体消息，并交流和参与政治议题。这些长期的趋势合起来便意味着信息基础设施有助于将国家权力去中心化，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及时调整管理策略、监管新型政治信息空间的政权。

我们还认为，数字媒体在这一地区的短期上街抗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我们知道，在“阿拉伯之春”的许多案例中，网上的对话在现实中的重要事件发生前就出现了。这可能是因为社交媒体为民主理念跨越国境的传播提供了结构上的准备，这种传播是通过非正式的家庭、朋友以及感兴趣的围观者组成的网络进行的。在主要的上街抗议之前发生的政治对话密度证明：虚拟网络比街道抗议更早成为现实。例如，在抗议开始前，详尽的地图和指南就已经出现了，给可能参加的抗议者提供了策略和非暴力的目标，力图维持抗议的时间段，让独裁政权之前的高压和压制手段失效。的确，当现实中的事件发生时，Facebook 页面和 Twitter 上的对话对于设计和尝试新的战略非常关键。政治博客——大部分是全国性的，也有一些是地区性的——将身在法国、英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流亡者群体聚拢起来。生产和消费政治内容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共担痛苦的感受，还创造了之前从没有过的政治功效，带来了如此可观、多元和迅速的动员。

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角色，但如果只考

虑信息技术的民主潜力，而忽略政权在管理和限制技术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那将是一个错误。的确，有几个政权在这方面非常娴熟，要么收编、要么打压技术提供者。对于独裁政权来说，一个关键的威胁是精英的背叛。因此，像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非常密切地运用一整套系统战略、监控和惩罚一系列试图进行在线政治参与的自发举动。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约旦，则容忍了这些行为，它们以为政治不满情绪可以在网上发泄掉，不会在线下造成实质性的后果。当这些不满情绪真的逐渐发泄掉的时候，独裁政权便通过一系列手段打压数字媒体的政治应用。在极端情况下，全球信息网络被整个隔离了。这种策略导致街道抗议大量增加，特别是在埃及，那里的个体改而使用传统的机制来互相寻找，比如利用开罗每周五祷告之后的聚礼。切断互联网，同样导致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中损失了巨额利益。在埃及，切断手机和互联网后，每天的损失高达 1800 万美元，整个过程的损失共计约 9000 万美元。

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的起因角色在于，它们提供了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基础设施。学者 Bennett 和 Segerberg 称之为“连接行动”(connective action)。在每一个国家发生抗议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上街的人及他们的领导者都没有取代世俗独裁者的政治野心，他们不是基地组织，不是伊朗的什叶派神权，也不是沙特的瓦哈比教派。相反，他们大多是城市居民和年青一代，他们感到自己的公民权利被现行政治体制剥夺，看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糟糕管理水平带来的巨大损失，以及最重要的，表达了一致且获得广泛认同的不满，这种陈述是他们互相交流之后，在网络的政治空间中共同写下的，有的是博客，有的则是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分享的视频，还有的是在半岛电视台、BBC 等国际媒体网站上的留言讨论。

革命的起因总是复杂的，反抗成功的条件总是很少见的。正如 Goldstone 观察到的，革命要想成功，政府必须看上去非常不公、无能，被看成是国家未来的威胁；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军事精英必须疏离了国家。这种情况在埃及和突尼斯确实发生了，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则发生得缓慢，在巴林和沙特拉伯则根本没有发生。政权的手也必须在不同种族、宗教信仰、阶级的群众中建立起广泛的共识，这在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几个国家中因为数字媒体而成为

现实。最后，国际力量必须要么拒绝介入，维护政府，要么则必须限制政府，不让它用太粗暴的方式维稳——西方国家在一些时候扮演了这两种角色，但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如此。

“阿拉伯之春”是历史上仅有的，因为它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所有这一系列政治动荡都有数字媒体扮演中介角色。数字媒体让本地公民可以接触国际媒体，在线的公民社会组织利用媒体网络发起游说倡导活动，西方支持组织如 AccessNow 和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帮助保护信息基础设施，与政权试图公然进行的暴力行为以及言论审查做斗争。当埃及的互联网被切断后，穆巴拉克同样取消了卫星广播的许可。作为回应，Google 开始直接将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的内容放到 YouTube 上播放。

中东北非地区的很多独裁者紧握权力的方式是告诉本国人，告诉邻国，也告诉国际社会：他们是避免伊斯兰革命的卫士。而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的个体很多都对前几代人的伊斯兰政治框架不感兴趣。一些伊斯兰政党可能从“阿拉伯之春”中获益了，比如突尼斯和埃及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但它们并不是抗议的激发者。实际上，它们非常犹豫要不要加入这场抗议，直到胜利和政治变革真的马上就要发生了才下定决心。

在这一地区的国家中，“阿拉伯之春”在技术普及率高、存在一个明显的精通技术的年轻公民社会的国家是最成功的，那些还没掌握如何管理信息基础设施的政权也是同样如此。技术普及率最低，或者公民社会弱小、技术资源匮乏的国家，抗议是最不成功的。这类国家包括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它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内战，但在这些国家，政治冲突的引爆事件也是数字媒体作为中介的。然而总体来说，这些国家的政治抗议中数字媒体的作用的确不同于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这几个国家都经历了重大的政治让步，有的是政权的民主化，有的则是取消政治制裁，更换统治精英。

那些看低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作用的人常常提出的一个观点是：是街上的人和他们的不满才成就了政治革命。对于这种观点，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包括 Gladwell、Rosenberg 和 Friedman 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尽管 Facebook 和 Twitter 可能在社会变革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真正的革命是在现

实中发生的。Rosenberg 写道，在政治变革中使用社交媒体的最大障碍是“人们需要那些人际关系才能开始行动——特别是当行动有风险且难度大时”。而 Friedman 则认为，“让穆巴拉克倒台的并不是 Facebook，也不是 Twitter，而是街道上的一百万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人民”。的确，Facebook 和 Twitter 都不是革命的单一起因，但忽视这一地区的公众对数字媒体小心而有策略的使用，忽视国际支持网络给活跃分子新的赋权方式，同样是愚蠢的。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伊朗十年来最大的抗议，导致了埃及临时解除加沙封锁，导致了把统治了几十年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赶下台的群众运动。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提供的信息基础设施，在主要的抗议还在形成时，便在活跃分子的群体中创造了深入的传播纽带和组织能力。的确，正因为数字网络发展得这样好，公民社会的领袖才能够如此成功地激活这样大规模的抗议。

社交媒体使得我们拥有如此好的事件记录。更重要的是，它们使得在埃及也可以通过新闻直播清楚地看到突尼斯正在发生什么，也可以使摩洛哥人、约旦人、也门人了解埃及的情况，使利比亚人和叙利亚人看到其他国家都在发生什么。换句话说，是社交媒体才让对成功社会抗议的叙述跨越了多重体制——而体制的边界之前是关闭着的。

事情也有进展不顺的时候，比如在巴林和利比亚，活跃分子注意到并记录下了一项经验：像巴林和利比亚这样的独裁政权采取了有意思的行动，它们解禁了曾经封锁的数字网络，以更好地监控抗议者的战略和行动。叙利亚政府同样非常迅速地发展了一套数字应对战略，有效地削弱了本国的活跃分子（该地区最大的在线公民社会之一）使用社交媒体系统性地进行组织。大多数情况下，是肉体上的威胁使得活跃分子不再在 Facebook 上进行政治活动方面的传播，但独裁政权同样发明了社交媒体策略，那就是雇佣一批人制造支持政府的内容，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也许，不能忽视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角色的最具说服力的原因是：针对其他因素的传统分析都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经济学人》杂志建立了一项指数，用它来分析新闻自由、腐败、民主机构、收入水平、年轻

人数量和独裁统治的时间是否可以预测这些政权的脆弱性。这项指数使用的许多变量，同样是传统的社交媒体理论家认为重要的——这些指数指向了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认为它们是最脆弱的政权。然而这些国家既不是“阿拉伯之春”开始的地方，也不是最典型的地方。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有一小拨活跃的技术精英帮助传播了其他国家反抗成功的消息，但强硬的独裁政权很快就做出了有力的回应，给出了自己的数字媒体战略。这些国家陷入了几个月的国内冲突，没有看到迅速的政权转换。那些经历了迅速的政权坍塌，或者政权做出了重大让步的国家，从指数上来看并不是那么脆弱——比如，埃及和突尼斯，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

如果执著于讨论多少个博客可以带来民主，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毫无疑问，总的来说，社交媒体和信息基础设施给社会运动的组织和大众抗议的动员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如学者 Bimber 所言：“社交媒体技术并不能决定政治成果，但可以改变政治中介、动员、组织的成本和收益关系。”

四

我们已经分析了哪些政权会更容易遭遇民众抗议，那为什么有的运动会比其他运动更加成功呢？信息技术在民主化的现代因素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在考虑多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后，我们发现，信息基础设施——特别是手机的使用——在解释政权脆弱性和运动成功性的简洁模型中非常关键。

在每一个案例中，“阿拉伯之春”的引爆事件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数字媒体有关。以手机、个人电脑和社交媒体的形式存在的信息基础设施，是“阿拉伯之春”的因果故事中不得不说的部分。人们会因为各种不同的个人原因被激发起来进行抗议，信息技术成为这种激发的中介，在接下来的几周中，革命接连发生，并且有着明显类似的模式。最后的政治成果当然是不同的，但这并不能压低数字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的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表明，那些不存在装备了“数字脚手架”的公民社会的国家，经历民众民主运动的可能性会小很多——这一观察，不仅仅建立在

对短暂政治动荡期的数字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更考虑了街道抗议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因素。

也许在几个国家中数字媒体改变了政治传播系统的最佳证据是最近宣布参选的政治候选人，他们因为成功的数字策略而变得更加大胆，并在竞选中继续使用信息技术。在埃及和突尼斯，竞选的头几轮中很显著的现象是，候选人都通过社交媒体策略吸引选民。对于不上网且对竞选政治也没什么经验的选民来说，面对面的交流是最重要的，但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同样使用互联网。不与伊斯兰政党结盟的独立候选人，如埃及的巴拉迪（Mohammed El Baradei），同样大量依靠 Facebook 来激活支持者的网络。在北非和中东的几个国家，数字媒体在协同反对的形成、阐明和激活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今，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独裁者下台后，这种信息基础设施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提供了一个可以移植的分析框架，可以描述数字媒体起中介作用的当代社会变革的几个阶段。数字媒体在整个区域中点燃了要求民主的民众抗议，而在此之前的多年中，数字媒体已经扮演了公民社会成长的手脚架。这些媒体是社会抗议的工具，也形塑了社会不满的现代特性、民众抗议的当代组织形式、公众表达异议所面临的变革中的机会结构。数字和社交媒体让这个地区的人们可以参与国际新闻的生产和消费，可以通过数字应用团结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可以巩固在线公民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培育新的政治公众，让女性和少数族裔也可以参与新形式的政治传播。有几家国际新闻机构提供了政治新闻，独裁政权只能笨拙地将其封锁。

我们同样提供了一个抗议动员的六阶段模型：

——能力建设阶段：这个阶段长达数年，在本地人群和流亡群体中，数字媒体不断扩散和巩固；

——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活跃分子学会创造性地使用数字媒体，彼此寻找，在共同的抱怨基础上建立稳固的关系，确立集体的政治目标；

——点火阶段：在这个阶段，将会出现导火索的事件，这些事件往往被主流的、国家控制的媒体忽视，但却刺激着大众的神经，并被公民社会群体放大；

——街道抗议阶段：在这个阶段，抗议是通过数字手段协调的；

——国际支持阶段：在这个阶段，数字媒体被用来吸引他国政府、流亡群体和海外新闻机构的注意；

——高潮阶段：在这个阶段，当局要么进行镇压，抗议者和统治精英陷入僵持，要么满足民众的要求；

——结束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变革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信息战将会爆发。

技术普及率最低，或者公民社会发展不健全也缺乏技术资源的国家，抗议的成功率低。但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中，抗议的导火索事件都是由数字媒体扮演中介的。从这个角度说，手机、个人电脑和社交网络都是这个因果故事中必须讲述的部分。当然，最终的政治后果各不相同，但这不能埋没“阿拉伯之春”中数字媒体的重要性。

(本文译自 *Democracy's Fourth Wave? —Digital Media and Arab Spring* 一书的结论部分，有删节，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 年 2 月。)